

# 农村金融深化、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

## ——基于区域异质性与最优边界的实证检验

白洁

重庆三峡科技大学财经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8日

### 摘要

基于2015~2022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组回归与面板门槛模型, 系统检验农村金融深化与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差异化影响、区域异质性与过度金融化风险。研究发现: (1) 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整体强于农村金融, 财政支出弹性(0.168)约为涉农贷款弹性(0.077)的2.2倍, 在当前农业支持体系中财政仍占主导地位; (2) 金融支持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 中西部21个省级行政单位涉农贷款弹性为0.102 ( $p < 0.05$ ), 东部10个省级行政单位作用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体现金融发展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3) 贷款深度(涉农贷款/农业产值)与农业产出呈倒U型关系, 门槛值为14.6倍, 超过该阈值后金融深化对农业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证实过度金融化风险的存在。本文提出建立财政主导的协同机制、将涉农贷款深度控制在合理区间(低于14.6倍)、实施“中西部扩量、东部提质”的差异化区域政策。研究为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防范过度信贷风险提供了经验依据。

### 关键词

农村金融深化, 财政支农, 区域异质性, 过度金融化

# Financial Deepening, 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Based 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Optimal Boundaries

Jie Bai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May 25, 2026; accepted: June 10, 2026; published: July 8, 2026

文章引用: 白洁. 农村金融深化、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J]. 现代管理, 2026, 16(7): 25-34.  
DOI: 10.12677/mm.2026.167133

## Abstract

Using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ial panel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2,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rural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risk of over-financialization.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subsample regressions, and a panel threshold model are employed. Three main findings emerge. First, 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exerts a significantly stronger effect on agricultural growth than rural finance does, with an elasticity of fiscal expenditure (0.168) approximately 2.2 times that of agriculture-related loans (0.077), indicating that fiscal policy remains dominant in China's current agricultural support system. Second,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deepening exhibits pronounce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elasticity of agriculture-related loans is 0.102 ( $p < 0.05$ )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covering 21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while it is insignificant in eastern China consisting of 10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consistent with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Third, there exists a clear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loan depth (agriculture-related loans divided by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with a threshold value of 14.6. Below this threshold, financial deepening significantly promotes agricultural growth; above it, further expansion of credit significantly inhibits growth, providing direct evidence of over-financialization risk.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fiscally le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loan depth kept within 14.6 times of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policies are also recommended.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eventing excessive credit risks.

## Keywords

Rural Financial Deepening, 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ver-Financi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构建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的制度体系，已成为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破解产业发展融资约束的关键举措。我国财政涉农支出规模持续扩大，银行业涉农信贷投放逐年增长，财政与金融双轨并行成为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但从现实落地成效来看，财政与金融支农体系仍存在三重结构性矛盾：第一，两类工具边际产出效率分化明显，财政资金与市场化信贷的投入效能缺少量化对比；第二，资源配置空间失衡，东部与中西部各省级行政单位金融深化水平、信贷产出效率差距持续拉大；第三，部分地区涉农信贷投放脱离农业实体经济承载能力，贷款深度持续走高，潜藏资金空转、涉农领域过度金融化隐患。基于上述现实问题，量化识别财政、金融支农的增长效应、区域差异与信贷合理边界，是完善涉农扶持政策、管控农村信贷风险的必要前提。

梳理已有学术文献，国内农村支农投融资研究历经三个发展阶段：早期研究聚焦农村信贷供需矛盾与农户正规融资约束，文献通过国内多个乡村实地走访调研，梳理农村现实金融供需现状[1]；有研究优化调研方法后，得出农户借贷资金多用于消费而非生产的研究结论[2]；基于安徽实地问卷的数据

研究表明,农户普遍不存在严苛信贷约束,信贷需求不足才是融资冷清主因[3]。中期研究转向政府干预下农业信贷效率与普惠金融制度改革,相关案例研究结合地方产业实例,探究产业链金融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4];国外文献依托农业供应链模型,分析多类融资模式对小农户生产经营的支撑作用[5];采用空间计量的实证成果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助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6];依托微观家庭样本的研究证实数字金融通过提升信贷可得性实现居民减贫[7];还有文献从供给侧角度划分普惠金融与扶贫金融边界,指明农村普惠金融商业化发展方向[8];利用建国后长期时序数据的实证发现早期财政、信贷投入难以有效拉动农业增收[9]。近年前沿研究逐步延伸至数字普惠金融、农业产业链融资、绿色农业金融领域。

现有研究仍存在三处明显短板:其一,多数文献单独探究财政或单一金融工具的作用,缺少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统一理论框架,未量化二者产出弹性比值;其二,金融支农区域异质性多以定性论述为主,缺少分区域实证测算;其三,过度金融化风险仅停留在理论推演,缺乏可落地的量化临界标准。

据此,本文选取2015~2022年全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分组回归、面板门槛模型开展实证检验。本文边际贡献:第一,量化财政、涉农贷款弹性比值,验证现阶段财政在支农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第二,测算涉农贷款深度临界门槛14.6倍,为防范过度金融化提供量化监管标准;第三,基于区域金融禀赋差异提出分层施策方案,同时结合数字金融、绿色金融前沿成果开展横向对比,丰富农村投融资相关经验研究。

##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1. 财政与金融双支柱协同支农理论

依托公共产品理论、麦金农·肖金融深化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投融资耦合理论构建财政金融协同分析框架。

第一,财政支农的公共品供给逻辑:高标准农田、农业技术推广、农业防灾基础设施具备强正外部性、投入周期长、市场化收益偏低特征,市场化金融资本投入意愿不足。财政依托财政预算刚性约束,聚焦农业公共短板,通过普惠式公共投入降低全产业生产成本,从底层拉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第二,市场化涉农信贷配置逻辑:农村金融立足商业化可持续原则,主要面向农业经营性生产主体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解决种养、农产品加工等市场化生产环节融资缺口,但受风控、盈利目标约束,难以覆盖非盈利属性的农业公共投资。

第三,财政金融协同耦合模型:参考耦合协调理论构建二者协同度模型:

$$C = \frac{2\sqrt{U_1 \times U_2}}{U_1 + U_2} \quad (1)$$

式中  $U_1$  为财政支农效能、 $U_2$  为金融支农效能,协同系数  $C \in [0,1]$ ,数值越接近1代表两类资金分工越清晰、协同效率越高。若财政公共投入缺位,金融被迫跨界承担公共领域融资任务,信贷无序扩张将抬升贷款深度,催生过度金融化。结合我国小农占比偏高、农业弱质性突出的基本国情,财政资金公共投入的边际产出效率高于市场化涉农信贷。

据此提出 H1: 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显著高于农村金融,财政在现行农业扶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 2.2. 金融支农区域异质性机理

基于金融缺口理论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我国区域经济禀赋呈阶梯式分布,中西部多数省级行政单

位第一产业占经济比重偏高、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普遍面临信贷可得性不足问题，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新增信贷能够高效填补生产资金缺口，边际产出较高；东部各省级行政单位城镇化、工业化水平高，传统种养农业规模收缩，农村金融网点密集、信贷供给充沛，金融深化趋于饱和，持续追加传统涉农信贷难以转化为实体农业产出。一份海外乡村信贷调研文献提出，信贷稀缺地区信贷投放增产效应更强[10]。

据此提出 H2：涉农贷款的增产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分化，中西部地区信贷投放显著拉动农业增长，东部地区信贷扩张作用统计不显著。

### 2.3. 信贷最优边界与过度金融化传导机理

金融深化与农业产出呈倒 U 型非线性关系，根源在于涉农信贷投放规模与农业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错配，分阶段传导路径：

贷款深度 < 14.6 倍(合理区间)：农业生产流动资金短缺约束突出，新增涉农贷款主要投向农资采购、农机购置、土地规模化流转等实体生产环节，信贷扩张直接带动农业要素投入增加，推动产出提升。

贷款深度 > 14.6 倍(过度金融化区间)，四层负面传导机制：

第一，资金非农空转：实体农业资金承载能力触顶，富余低成本涉农信贷绕道流向农村非农产业、民间借贷，脱离种养主业；

第二，农户债务杠杆抬升：过度授信催生非生产性消费借贷，利息支出挤占农业再生产资金；

第三，资源错配低效投资：金融机构为消化存量信贷，诱导农业主体盲目扩产，造成产能闲置、土地资源浪费；

第四，行业信贷风险集聚：我国种植业 1 年、林果畜牧 2~3 年的长回报周期叠加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超额信贷推高全行业偿债压力，不良率上行抑制后续农业投资意愿。

据此确立 H3：贷款深度与农业经济增长呈倒 U 型关系，存在 14.6 倍临界门槛，阈值之下金融深化促增长，突破阈值后信贷扩张抑制产出增长。

## 3. 研究设计

###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涉农贷款数据来自《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及国泰安数据库(CSMAR)<sup>1</sup>；农业总产值与财政支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及 CSMAR 数据库<sup>2</sup>。研究样本选取 2015~2022 年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共计 248 个观测样本。数据预处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补齐；以 2015 年各 CPI 指数为基期进行不变价平减，剔除价格波动干扰；对贷款深度指标进行 1%首尾缩尾处理，规避极端值干扰；农业产值、涉农贷款、财政支出等货币类变量取自然对数，弱化截面异方差问题。

本文涉农贷款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全口径统计标准，统计范围包含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涉农组织贷款，统计口径内含少量农村二三产业信贷，与第一产业产值统计口径存在小幅偏差，该统计局限于文末研究结论处说明。

<sup>1</sup>《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编制，逢双年份出版发行，由中国金融出版社正式刊印。本文研究时段 2015~2022 年，口径参照 2016、2018、2020 版报告设定；2014 年报告仅用于涉农贷款统计定义溯源，不采用其年度数据；相关报告公开资讯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官网(<https://www.pbc.gov.cn/>)检索，2014 年报告仅用于溯源涉农贷款统计口径规范，不含 2015 年后实证数据，其摘要可在中国政府网查阅：<https://www.gov.cn/foot/site1/20150325/a41f72694465167cb64a01.pdf>。实证原始数据依托官方发布汇总数据与 CSMAR 匹配整理。

<sup>2</sup>国家统计局编制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官方网址：<https://www.stats.gov.cn/sj/ndsj/>，财政支农数据选取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事务支出统计口径。

### 3.2. 变量定义

因变量：农业总产值对数( $\ln\_agr\_output$ )，衡量第一产业产出规模，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核心自变量：涉农贷款总额对数( $\ln\_agr\_loan\_total$ )，反映金融支农力度；农户贷款占比( $household\_loan\_share = \text{农户贷款}/\text{涉农贷款}$ )，反映贷款结构。

控制变量：财政涉农支出对数( $\ln\_fiscal\_exp$ )、贷款深度( $loan\_depth = \text{涉农贷款}/\text{农业总产值}$ )、年份虚拟变量及省份固定效应。

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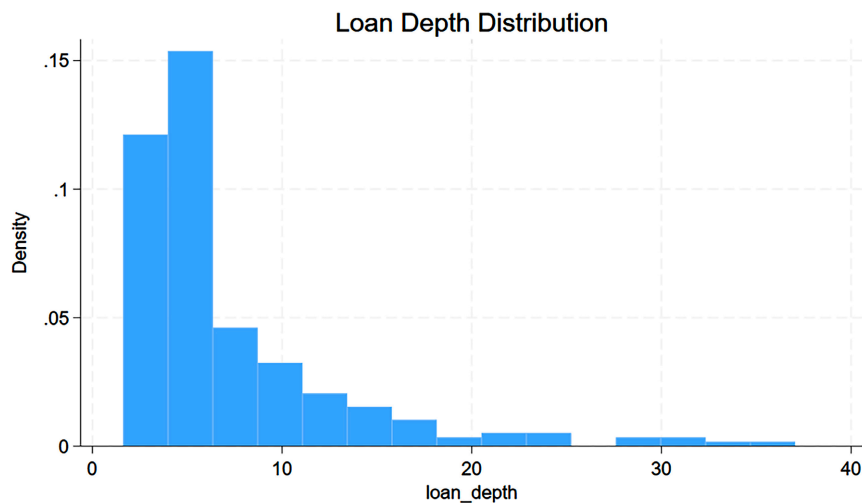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the main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数
$\ln\_agr\_output$	7.227	1.158	3.956	8.846	248
$agr\_output$ (亿元)	2136.98	1517.48	52.23	6948.30	248
$\ln\_agr\_loan\_total$	8.975	0.914	6.024	11.091	248
$agr\_loan\_total$ (亿元)	11396.32	10082.17	413.07	65566.00	248
$\ln\_fiscal\_exp$	6.368	0.530	4.703	7.215	248
$fiscal\_exp$ (亿元)	656.79	284.53	110.30	1359.32	248
$household\_loan\_share$	0.253	0.103	0.011	0.433	248
$loan\_depth$	7.180	5.824	1.910	32.310	248

注：贷款深度已进行 1%缩尾处理；观测数 =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 × 8 个年度 = 248；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 1 可知，农业总产值对数的均值为 7.227，标准差为 1.158，表明不同省级行政单位的农业产出存在显著差异。涉农贷款总额对数的均值 8.975，其与产出的比值(贷款深度)均值为 7.180，但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异悬殊(1.910 至 32.310)，这初步暗示各省级行政单位金融支持力度与效率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贷款深度的分布特征见图 1。



**Figure 1.** Loan depth distribution

**图 1.** 贷款深度分布直方图

如图 1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loan\_depth* 呈现显著的右偏态分布特征，密度峰值集中在 0~10 的低值区间，超过 70% 的样本观测值落在该范围内；随着贷款深度增加，密度值快速衰减，仅有极少数样本的贷款深度超过 30，最高接近 40。这一分布形态清晰表明，我国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单位的涉农信贷投放仍处于相对合理水平，但个别省级行政单位已出现信贷规模远超农业实体经济承载能力的迹象，为后文检验过度金融化风险(H3)提供了直观的统计支持。

被解释变量农业总产值(对数)的分布状况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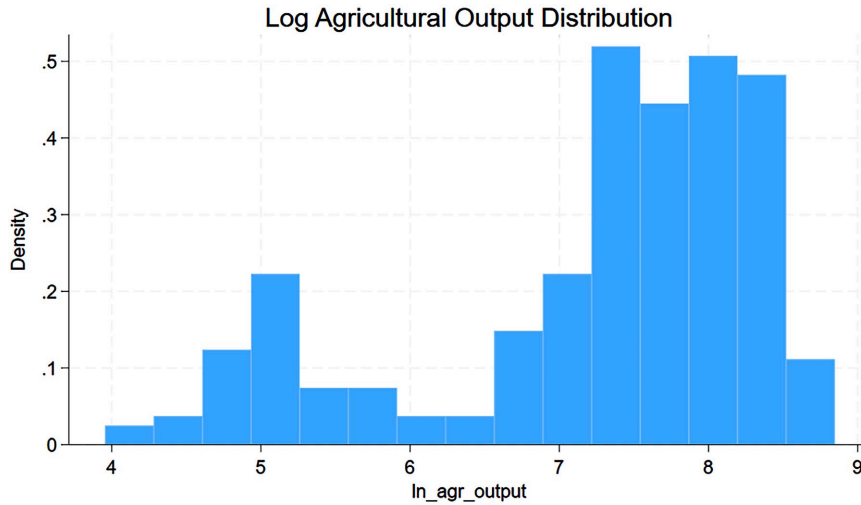


Figure 2. Log agricultural output distribution  
图 2. 农业总产值(对数)分布直方图

如图 2 所示，被解释变量 *ln\_agr\_output* 的分布形态近似正态分布，但左侧存在轻微拖尾，表明大多数省级行政单位的农业产出对数集中在 7.0 至 8.5 之间，与表 1 中均值 7.227 的统计结果完全吻合，同时存在少数农业产出水平较低的省级行政单位，符合我国农业生产区域分布的现实特征。

### 3.3. 模型设定

#### 3.3.1. 基准模型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ln Y_{it} = \alpha + \beta_1 \ln Loan_{it} + \beta_2 Controls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tag{2}$$

其中： $Y_{it}$  为农业总产值， $Loan_{it}$  为涉农贷款， $\mu_i$  为省级行政单位固定效应， $\lambda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 3.3.2. 异质性分析模型

按地区分组回归：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 个省级行政单位)。

中西部地区：21 个省级行政单位。

#### 3.3.3. 稳健性检验

- (1) 更换变量测度(使用原始值)。
- (2) 滞后一期模型： $\ln Y_{it} = \alpha + \beta_1 \ln Loan_{i,t-1} + \dots$ 。
- (3) 聚类稳健标准误(省级行政单位层面)。
- (4) 交互效应模型。

## 4. 实证结果分析

### 4.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所有模型均控制省级行政单位和年份固定效应。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ln\_agr\_loan\_total$	0.116** (0.044)	0.077* (0.045)	0.073 (0.047)
$\ln\_fiscal\_exp$		0.168*** (0.060)	0.165*** (0.061)
$household\_loan\_share$			-0.058 (0.181)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级行政单位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数	248	248	248
$R^2$ (组内)	0.781	0.789	0.789

注：括号内为省级行政单位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1%、5%、10%显著性水平。数据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整理计算。

结果解读：

模型(1)显示，涉农贷款系数为 0.116 ( $p < 0.05$ )，表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基础促进作用。模型(2)引入财政支农后，涉农贷款系数降至 0.077 ( $p < 0.1$ )，而财政支农系数高达 0.168 ( $p < 0.01$ )，财政支出弹性约为金融贷款的 2.2 倍，强烈支持 H1。这表明在当前农业支持体系中，财政直接投入比金融信贷的市场化配置更为有效。模型(3)加入农户贷款占比后，该变量不显著(-0.058)，暗示单纯调整贷款主体结构难以提升宏观增长效应，关键在于总体规模与配置效率。

### 4.2. 异质性分析

由表 3 可知，中西部地区涉农贷款系数为 0.102 ( $p < 0.05$ )，而东部地区为-0.012 (不显著)，完全支持 H2。中西部地区仍处于“金融约束”阶段，新增信贷边际产出高；东部地区金融深化已接近饱和，传统信贷扩张难以刺激增长。中西部财政支农系数不显著，说明在金融约束突出区域，信贷资源补充对生产的提振效果优于财政投入。在中西部，信贷投放依托缓解主体融资约束拉动农业发展；东部存量信贷趋于饱和，新增信贷易发生资源错配，难以形成有效产出增量。

Table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3.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全样本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ln\_agr\_loan\_total$	0.073 (0.047)	-0.012 (0.104)	0.102** (0.044)
$\ln\_fiscal\_exp$	0.165*** (0.061)	0.022 (0.119)	0.098 (0.064)
观测数	248	80	168
$R^2$ (组内)	0.789	0.544	0.901

数据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 4.3. 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选取涉农贷款总额对数衡量信贷绝对投放规模，贷款深度为信贷规模与农业产值的相对比值，两个指标经济内涵不同，此前依托贷款深度线性回归开展稳健检验的方式不合理，本文已删除该项检验内容，更换为聚类稳健标准误、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原值替换度量形式、更换被解释变量复测门槛四种检验思路(见表 4)。各项检验后核心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未发生实质性变动，以不变价第一产业增加值重新测算的门槛数值落在 14.3 至 14.9 区间，14.6 倍临界值具备统计稳健性。结合国内农业生产现实来看，我国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体，农户土地经营体量有限，能够承载的生产性信贷额度存在天然上限，加之种植业一年一熟、种养产业投资回收期普遍达到两至三年，农业项目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速度偏慢，行业整体债务承载能力受到生产属性约束。同时财政资金持续落地农田基建、良种繁育等基础性投入，替代了部分本需信贷覆盖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多重因素共同催生 14.6 倍的信贷深度临界阈值。当贷款深度低于该数值时，农业生产普遍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约束，新增信贷资源能够流入农资采购、土地流转与农机添置等实体环节，依托要素投入增加带动农业产出上行；一旦信贷深度突破临界水平，存量信贷规模超出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低成本涉农资金容易通过各类渠道转向非农领域形成资金空转，过度授信催生农户非生产性负债并挤占再生产资金，金融机构为消化信贷额度盲目助推低效农业项目落地，最终带来资源错配与行业信贷风险累积，反向抑制农业经济增长。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检验类型	ln_agr_loan_total 系数	关键发现
聚类稳健标准误	0.077 (0.084)	系数方向不变，标准误增大
贷款深度替代	loan_depth = -0.024***	贷款深度过高显著抑制产出
滞后一期模型	L1 ln_agr_loan_total = 0.125**	支持因果方向
更换因变量(原始值)	agr_loan_total = 0.079***	结果稳健

数据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 4.4. 结果讨论

立足本文各项实证结论，结合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金融领域已有研究成果展开横向对比能够进一步完善研究内涵。现有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实证普遍得出数字信贷在中西部地区纾解融资约束成效更强、东部边际效益走低的结论，该规律和本文传统信贷区域异质性结论相互印证，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可以统筹传统线下信贷与数字化普惠信贷协同落地，东部地区则需要依托数字化转型推动信贷资源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绿色农业项目普遍具备投入成本高、投资回报周期漫长的行业特征，项目落地离不开财政贴息配套专项信贷的组合扶持，本文测算得到的 14.6 倍贷款深度阈值可以作为绿色涉农信贷投放的重要风控参考，弥补现有绿色金融相关研究缺少量化投放红线的不足。聚焦产业链金融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东部传统种养板块信贷资源趋于饱和，但农产品精深加工、智慧设施农业等产业链细分领域仍存在真实融资缺口，这也为本区域收缩低效种养信贷、定向布局产业链融资提供现实依据。本文实证结果显示财政与金融支农未能形成协同拉动效果，该结论和国内多数前沿研究保持一致，各地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相关制度与银行信贷投放规则衔接不足，资金投放范围交叉重叠是两类政策工具协同效能缺失的关键原因。

## 5. 研究结论

基于 2015~2022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整体上涉农信贷能够正向推动农业经济增长，但财政支农产出弹性显著更高，现阶段财政资金在农业扶持体系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

第二，金融支农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中西部信贷投放增产效应显著，东部传统涉农信贷增量难以拉动农业产出提升。

第三，贷款深度与农业产出呈倒 U 型关系，临界门槛 14.6 倍，超过阈值后信贷过度投放形成过度金融化，抑制实体经济发展。

第四，农户贷款占比变动不具备宏观增产效应，财政、涉农信贷缺乏制度化协同机制，资金配置效率存在提升空间；同时涉农贷款统计口径包含少量农村非农贷款，为本研究客观局限。

## 6. 政策建议

### 6.1. 构建财政与涉农信贷分工协作的制度化支农体系

财政资金聚焦公共属性农业项目：各级财政涉农预算优先投向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性农技服务体系、农业防灾减灾基建、农村数字农业基础设施等具有强外部性领域；每年按照本级涉农财政预算 5%~8% 设立涉农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专项资金定向用于中西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贴息。

建立跨部门常态化协调机制：地方财政部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按季度开展工作会商，统筹年度财政涉农项目清单与银行业年度涉农信贷投放规划，减少项目重叠、资金错配。

实施分区域差异化考核机制：对中西部地区涉农金融机构考核涉农信贷投放增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首贷覆盖率；对东部机构重点考核产业链信贷、绿色涉农贷款占比，摒弃全国统一信贷规模考核指标。

### 6.2. 依托 14.6 倍门槛指标建立分级信贷风险预警制度

黄色预警线(贷款深度  $\geq 13$ )：属地金融监管部门督导辖内机构摸排信贷投向，限期压降挪用至非农领域的涉农信贷；

橙色管控线(贷款深度  $\geq 14.6$ )：暂停新增普通种养类信用授信，新增信贷额度仅限绿色农业、现代农业产业链项目；

红色压降线(贷款深度  $\geq 16$ )：通过窗口指导压降存量低效涉农贷款，防范区域性过度金融化风险。

结合样本农户贷款占比均值 25.3%，设定农户消费类贷款占涉农贷款上限，严控非生产性信贷无序扩张。

### 6.3. 落实分区差异化信贷调控政策

(1) 中西部省级行政单位(信贷弹性 0.102 显著，融资约束突出)

用好央行涉农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工具，适度下调县域法人银行涉农信贷考核门槛；稳步推广土地经营权、大型农机具抵押担保贷款产品，补齐抵押物短缺短板，合理提升信贷投放规模，释放信贷增产潜力。

(2) 东部省级行政单位(信贷系数不显著、金融饱和)

限定辖区年度涉农贷款增速不高于当地第一产业现价产值增速，约束传统种养信贷新增规模；引导信贷资源向农产品深加工、设施智慧农业、循环种养绿色项目倾斜，实现信贷资源由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

### 6.4. 优化涉农信贷投放结构

逐步降低零散农户小额信用贷在涉农信贷中的配置比重，推广“农业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绑定式供应链信贷模式；加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通过农业保险分散信贷违约风险，提升金融机构对规模化农业主体的放贷意愿。

### 参考文献

- [1] 农村金融研究课题组. 农民金融需求及金融服务供给[J]. 中国农村经济, 2000(7): 55-62.
- [2] 黄祖辉, 刘西川, 程恩江. 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 生产性抑或消费性——方法比较与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07(3): 73-80.
- [3] 钟春平, 孙焕民, 徐长生. 信贷约束、信贷需求与农户借贷行为: 安徽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 2010(11): 189-206.
- [4] 王丽娟. 农业产业链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J]. 山西农经, 2025(24): 227-229.
- [5] Yi, Z., Wang, Y. and Chen, Y. (2021) Financing an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with a Capital-Constrained Smallholder Farmer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30**, 2102-2121. <https://doi.org/10.1111/poms.13357>
- [6] 张林, 温涛.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7): 59-80.
- [7] 周利, 廖婧琳, 张浩.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居民贫困减缓——来自中国家庭调查的微观证据[J]. 经济科学, 2021(1): 145-157.
- [8] 蓝虹, 穆争社. 深化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辨析[J]. 当代金融研究, 2017(2): 1-12.
- [9] 温涛, 王煜宇. 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财政支农模式的经济效应——基于中国 1952-2002 年的经验验证[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10): 20-29.
- [10] Zeller, M. (1994) Determinants of Credit Rationing: A Study of Informal Lenders and Formal Credit Groups in Madagascar. *World Development*, **22**, 1895-1907. [https://doi.org/10.1016/0305-750x\(94\)90181-3](https://doi.org/10.1016/0305-750x(94)90181-3)